



# 《实践论》 《矛盾论》

# 导读

陈福雄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实践论》  
《矛盾论》 导读

陈福雄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粤)新登字 11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践论》、《矛盾论》导读/陈福雄 主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12

ISBN 7-306-00821-8/D·78

- I 《实践论》、《矛盾论》导读
- II 陈福雄
- III ①《实践论》和《矛盾论》② 导读
- IV D02

责任编辑:施国胜 责任校对:马杰仁  
封面设计:方楚娟 责任印制:姚明基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中山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20 万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6.20 元

# 目 录

(133)	.....	(三)
(130)	.....	(四)
(119)	.....	(五)
(129)	.....	(六)
(133)	.....	(七)
(142)	.....	三
	<b>导论：两朵智慧之花——《实践论》、《矛盾论》</b> .....	(1)
(182)	(一)“两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	
(168)	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1)
(171)	(二)“两论”在思想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14)
(181)	(三)“两论”的出版和修订.....	(22)
	<b>一、《实践论》基本思想</b> .....	(26)
(166)	(一)划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	
(199)	思想理论界限.....	(26)
(102)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32)
(212)	(三)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	(42)
(191)	(四)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56)
	(五)真理和真理的标准.....	(58)
	(六)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63)
	(七)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	(73)
	(八)“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	(78)
	<b>二、《矛盾论》基本思想</b> .....	(84)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	(84)
	(二)两种宇宙观.....	(90)

- (三)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 (97)
- (四) 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 ..... (106)
- (五) 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 ..... (116)
- (六)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 (126)
- (七) 新陈代谢规律 ..... (133)

三、《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145)

- (一) 实事求是与《实践论》、《矛盾论》 ..... (145)
- (二) 群众路线与《实践论》、《矛盾论》 ..... (162)
- (三) 独立自主与《实践论》、《矛盾论》 ..... (168)
- (四) 改革开放与《实践论》、《矛盾论》 ..... (174)

四、《实践论》、《矛盾论》探微 ..... (189)

- (一) 关于“知行统一观” ..... (189)
- (二) 关于“矛盾的集合点” ..... (196)
- (三) 关于过程及其两重性 ..... (199)
- (四) 关于“两类矛盾” ..... (204)
- (五) “两论”中的“AB论点” ..... (242)

编后语..... (249)

## 导论：两朵智慧之花

### ——《实践论》、《矛盾论》

毛泽东同志是列宁、斯大林之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自1920年秋冬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毛泽东同志以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无私奉献精神投身到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去；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勇于和善于总结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写出了无数闪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篇章，从理论到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矛盾论》（下称“两论”）就是其中最杰出的哲学论著，是长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棵树上的两朵结果实的智慧之花。

#### （一）“两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以往，人们从“两论”的写作目的和中国革命的需要广泛研究了它们的产生，这是应该肯定的。现在，我们试图从“两论”赖以产生的深厚的实践基础、多方面的理论条件和具体的社会环境，再来探讨“两论”产生的客观和主观的依据，揭示“两论”问世的历史逻辑。

“两论”产生的实践基础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社会文明的灵魂。“两论”集注着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精神。

第一，“两论”总结和概括了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经验。

本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阶段演进到垄断阶段。以前苏联人民为首的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成为时代的主题。30年代中期，世界人民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浪潮，一浪高一浪。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革命，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环节；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国内外阶级斗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既有共同性、普遍性，又有差别性、特殊性。“两论”反映了国内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联系和经验。

如果我们只限于从国内革命实践去了解“两论”的经验基础，那显然是不够的。其实，从“两论”文字直接反映出来的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看，至少有如下几方面：

(1) 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创立的条件概述（《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3、297、300、303、314、317、318页，以下凡见同上书的，只标页码）。

(2) 关于列宁主义产生的概述（第287、314、318、319页）。

(3) 关于前苏联哲学界反对德波林学派斗争经验的概述——确认“差异就是矛盾”（第299、306、307、335页）。

(4) 关于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比较、民主革命方法与社会主义革命方法比较，从而取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的经验概述（第311页）。

(5) 关于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转化的概述（第329、330页）。

(6) 关于俄国、法国、蒙古和中亚细亚各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互关系各有特殊性的概述（第 331 页），等等。

如果我们把“两论”中这些方面的概述，只看作偶然的孤立的举例或附注，那么，我们就不能更深入地理解“两论”产生的广泛充实的实践基础和真实意义。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两论”总结了 1921 年至 1937 年中国革命“两次胜利”的经验和“两次失败”的教训。头一次胜利，是北伐战争的胜利：1923 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举行了从广东出发的北伐战争，战果辉煌。北伐的胜利，是统一战线的胜利，也是在矛盾的斗争中把握同一的辩证法的胜利。另一次胜利，是土地革命的胜利：1927 年 8 月 1 日，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军队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军队在江西井冈山会师，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成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这表明，党有了自己独立指挥的革命武装，有了党领导下的根据地红色政权及拥护党和红色政权的广大群众。土地革命的胜利，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也是认识中国社会矛盾特殊性，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初步胜利。

胜利的经验是可贵的，应该总结的；失败的教训也是难忘的，必须记取和反思的。中国革命的头一次失败，是 1927 年北伐到达武汉之后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背叛革命、分裂统一战线，致使千百万共产党人人头落地。这次失败说明，在矛盾同一中掌握斗争、坚持党对革命和军队领导权的重要性。《矛盾论》有 7 处具体谈到这次失败的教训（第 303、315、316、321、324、325、329 页）。另一次是 1930 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举行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根据地缩小了，红军由 30 万人减少到 3 万人。这次失败的教训是很



深刻的，值得认真反思的。《矛盾论》有3处具体谈到了这次失败的教训（第303、316、325页）。

第二，“两论”总结和概括了二三十年代党内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经验。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是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然而，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思想斗争；党内的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现。党外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和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是相通的。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与党内斗争状况相联系。从1921年至1937年，党内发生了较大的“两次右倾”、“两次‘左倾’”的错误；这些错误，直接殃及党的事业、革命的进程。

党史上第一次右倾错误是陈独秀放弃党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错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提出“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忽视、放弃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忽视、放弃党对武装组织和武装斗争的领导。这是大革命失败的党内根源。广州的“中山舰事件”，就是陈独秀右倾错误带来的恶果之一。陈独秀错误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夸大矛盾的同—性，否认矛盾的斗争性，错误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八七”会议从组织上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发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基于当时的条件限制，不可能对其作出系统的哲学分析。

土地革命时期，李立三、王明先后犯了“左”倾错误。“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地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搞“飞行集会”、“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御敌于国门之外”，“毕其功于一役”；对同志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毛泽东同志说：“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

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sup>①</sup>从哲学上说，“左”倾机会主义者割裂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夸大普遍性，抹杀特殊性。“左”倾错误的后果是严重的。

抗日战争时期，王明从“左”滑到右，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个口号的要害是放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权，放弃党对军队的独立指挥权。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国民党的批准。与前次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的理论失误相似，都是夸大矛盾的同一性，否认矛盾的斗争性。

党内两次“左”倾、两次右倾错误的实质，都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地位，从组织上纠正了党内“左”的错误，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两论”写作的目的，正如《实践论》题注所指出的，是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

第三，“两论”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系统地、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了党的最高领导者毛泽东同志长期积累的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

“两论”，既是党和人民集体经验的结晶，又是毛泽东同志长期积累的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的升华。无论是从全党、全局来考察，还是从毛泽东同志本人考察，“两论”的产生都不是纯粹偶然的，不是心血来潮之作，而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是实践经验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必然飞跃。

与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较，毛泽东同志的实际斗争经验具有自身的优越性。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1页。

(1) 毛泽东同志生活、战斗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当时有 4.5 亿人）国家，直接领导着最广泛的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由此而来的斗争经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2) 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现代国际上受外国列强侵略和掠夺最严重的国家，国内外阶级关系、阶级矛盾也是最尖锐、最复杂的；处理当时中国社会内外阶级关系和矛盾，需要特别高超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

(3) 毛泽东同志从 1921 年到 1937 年经历了 17 年艰苦的军事斗争，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组织、领导和指挥革命战争时间最长、指挥战役最多的统帅。有资料认为，自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领导了大小 130 多次起义和战役。红军长征，就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创举。“毛泽东用兵如神”传遍中外。《实践论》阐述的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是以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为出发点的；《矛盾论》的矛盾分析，主要是以中国社会具体的阶级矛盾为对象的。毛泽东同志的实际斗争经验是任何人难以比拟的。

毛泽东同志 17 年的斗争历程是曲折的，斗争经验是不断拓展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被“左”倾路线打击过，深受其害。总结曲折斗争的痛苦经验，特别可贵。更值得注重的是，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同志只是一个方面、根据地方面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者，而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已经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实际上主持全党和全军的全面工作；这个时期，党和人民进行着比以往更艰巨、更复杂的斗争，要认识和处理党内外、国内外、军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这无疑给了毛泽东同志最全面、最广泛的实际锻炼和发展的条件。尤其是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前后，处理国共两党、中美双方关系，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同志成为党的方针的主要决策者，战略战术的最高决策者。与井冈山

时期比较，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经验更丰富、更全面。

由此可见，“两论”具有非常深厚的社会实践基础。

## 2. “两论”产生的理论条件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扎根于神州大地，生根、开花、结果，大约20年出现一个高潮，收获一批丰硕成果。

第一个高潮期：1901—1921年。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说》等一系列论著，谈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1903年2月，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一文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初步向我国学者、读者介绍唯物史观；马君武说：“马克司（思）者，以唯物论解释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朱执信等人也撰文宣传马克思及马克思的学说。最引人注目的是，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后来，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1920年3月，李大钊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1919年12月至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等论著，并且到北大、北京女子高师等院校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李达同志从1918年秋至1920年春，在国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著作，寄回国内发表。陈独秀于1920年前后也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等文章。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此前后，他还翻译出版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反杜林论》等论著。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以湖南为基地，领导了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组织“新民学会”，办《湘江评论》，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传播和运用的头 20 年最突出的成果。

第二个高潮期：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大胆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并从理论上创造性地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时期，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在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中，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建党思想已经形成为科学体系。“两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出现的两朵永远盛开的思想理论之花。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七大”的胜利召开、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运用第二个 20 年里的辉煌成果。

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党和人民制订并实现了社会主义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并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的第三个 20 年里的丰硕成果。

当代高潮期：近 20 年，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理论上作了规律性的概括，集中反映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的最新成果。

只有把“两论”放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长过程中去考察，才能深刻地领会“两论”产生的思想理论渊源和条件。

第一，“两论”的写作，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原著（中译本）和前苏联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中译本）在我国的出版发行、广泛传播为直接的理论条件的。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苏联的理论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在中国广为流传。1930年6月，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成立并提出纲领性要求：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出版、宣传马、恩、列、斯的论著，又要积极投身于火热的实际斗争中去，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工农兵群众进行斗争的尖锐武器。这个时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和教科书有：《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主义问题》以及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合编的《辩证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译）；米丁和拉里察维基等人编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郑易里译）；米丁等人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沈志远译）；河上肇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理论》（李达等译）。从“两论”引文注释分析，引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2处；引述恩格斯《反杜林论》2处；引述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做什么？》、《共产主义》、《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的评注》、《再论职工会、时局及托洛茨基、布哈林之错误》等论著共18处；引述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1处。这些引文表明毛泽东同志当时广泛研读了我国翻译出版的马、恩、列、斯的原著。

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可知，1936年11月—1937年4月毛泽东同志研读了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和雷仲坚译的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1937年7月以前,研读了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1938年12月以后研读了博古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毛泽东同志研读上述论著的批注有三个特点:

- (1) 注重书本文论的实质思想。
- (2) 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批注和解疑。
- (3) 破、立观点鲜明,富于革命性、战斗性。“两论”中一些哲学观点、论断和命题,可以在批注中发现它的原型或源头。

第二,“两论”的写作,还得益于研读30年代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著。

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和苏联理论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毛泽东同志写作“两论”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理论条件。而我国3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撰写的论著,也为“两论”的写作,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料。毛泽东同志研读的论著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选辑》、《哲学与生活》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研读这些著作,对写作、修改“两论”起了积极的作用。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致艾思奇同志的信中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sup>①</sup>

第三,“两论”的写作,批判继承了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在对古代哲学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性研读中,也引出积极的反思成果。

从《毛泽东书信选集》可知,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同志写信给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同志,要他购买一批书籍回延安,其中,信上点名要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买一部

<sup>①</sup>《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2页。

孙子兵法来”<sup>①</sup>。《矛盾论》第3节引述了《孙子兵法》里“谋攻”篇关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话，以此强调看问题要全面，反对片面性、一点论。毛泽东同志以《矛盾论》为书名，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承继了我国古代思想家对矛盾关系的认识，如《易经》谈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矛盾论》还引述了《资治通鉴》、《水浒传》、《山海经》、《汉书·艺文志》、《聊斋志异》等古典文论中体现辩证法思想的话和典故。《实践论》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表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传统的认识论“知”“行”范畴的批判继承和改造。

综上所述，“两论”的写作，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译文）为直接的思想理论条件的，同时还吸收了我国3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积极思想，批判继承了我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传统。

### 3. “两论”产生的社会环境

第一，从国际社会分析，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三十年代以斯大林元帅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进行着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农业化、工业化的建设，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树立了一面旗帜，展示了光明的前景，赋予他们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和力量；同时，又为创造性地宣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了现实的、活生生的榜样。无可置疑，在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力量确实起到了极其巨大的鼓舞作用。

30年代，苏联哲学界严肃地批判了德波林学派。德波林学派

<sup>①</sup>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1页。



的本质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政治，反对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德波林学派曲解哲学的党性，千方百计使哲学教学和研究摆脱党的政策和方针，还否认哲学上的列宁阶段。1930年以前，德波林学派的哲学在中国哲学界颇为流行。由于德波林曾经批判过布哈林的机械唯物主义，当时中国有些人看不出德波林是一个孟什维克唯心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内受德波林学派影响的一些人也逐渐滋长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矛盾论》里指出：“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第299页）“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第299页）既然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与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一脉相承，那么，苏联哲学界批判了德波林学派，实际上等于消除了、割断了党内教条主义者思想理论的国外根源，更有利于我们开展整风运动，有利于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是写作“两论”的一个良好的国际社会环境。

第二，从国内社会分析，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为“两论”的写作创造了前期难得的国内环境。

中央红军是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翻阅《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目录便可知，从1926年到1936年，收入《选集》的文章每年只有1—2篇；1934年2月至1935年10月（长征时期）未收入文章；长篇论著开始于长征结束之后即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1936年12月在陕北红军大学的讲话《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收入《选集》的1937年写的论著有10篇，1938年写的有6篇，1939年写的有13篇，1940年写的有12篇，1941年写的有8篇，1942年写的有7篇，1943年写的有5篇，1944年写的有4篇，